

# 对曼德尔长波理论的三重维度解读

黄 瑾 唐 柳

**内容提要** 在研究资本主义长波的众多理论中，曼德尔给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他的长波理论呈现出三重维度：第一重维度是在固定资本更新论的基础上突出技术视角，围绕技术与利润率的互动关系展开阐述；第二重维度是基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从方法论层次提出了半自主的中间变量，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规律与外生因素有机结合，力求实现总资本的运动逻辑与具体历史的统一；第三重维度是将长波置于整个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提出了超级长波—长波—工业周期的框架，表明在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背景下，扩张长波实现的困难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恶化。曼德尔从技术与利润率、内生因素与外生因素、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三重维度构建的长波理论为认识资本主义的未来发展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提供了有益的视角。

**关键词** 曼德尔；长波；利润率；马克思主义

**作者** 黄瑾，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唐柳，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资本主义经济存在波动，按照时间长短，一般可以分为短周期、中周期和长周期，其中长周期即长波是指资本主义经济每隔大约 45—60 年一次的波动。长波最早由荷兰社会主义者范·盖尔德伦于 1912 年提出，20 世纪 20 年代苏联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在《经济生活中的长波》《大经济循环》中系统论证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问题，1939

年熊彼特在其著作《经济周期》中将此类长波称作康德拉季耶夫周期。<sup>①</sup>对长波的解释大体上可以分为三派，一派是以熊彼特为代表，后经佩雷斯等继续发展，强调技术创新对长波的决定性作用；一派是分别以戈登、鲍尔斯为代表的美国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SSA学派）和以阿格列塔、布瓦耶为代表的法国调节学派，赞同资本积累过程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由此产生了长波；一派是欧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sup>②</sup>提出的以利润率为中心，将内外生因素结合考察长波变动。在众多研究中，曼德尔对长波的研究呈现出鲜明的独特性，他既不赞同技术—经济范式的分析方法，也不认可长波完全是由资本主义积累的社会结构造成的。作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活动家、经济学家的曼德尔强调“我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阐述资本主义发展长波”，<sup>③</sup>他对资本主义长波的研究体现在《晚期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解释》等文献中。国内外学者对曼德尔长波理论的解读大致按照两种思路进行。第一，围绕长波产生的原因进行探究。一些文献认为曼德尔从扩张长波转向萧条长波是基于资本主义内在规律，而从萧条长波转向扩张长波则将利润率的上升完全看作是外在因素造成的。<sup>④</sup>第二，围绕曼德尔提出的半自主变量，探究这种半自主变量的作用。一些文献认为曼德尔力求通过半自主变量在资本的抽象规律与具体历史之间搭建桥梁，但与SSA学派相比，曼德尔没有发展出介于二者之间的中间层面分析，也没有构建介于二者之间的子系统。<sup>⑤</sup>以上两种思路从不同侧面探究了曼德尔理论的有关内容。在学界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将从技术与利润率、内生因素与外生因素、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三重维度较系统地梳理与较全面地阐释曼德尔的长波理论。

① 关于长波理论的最早提出者和早期研究者的论述，可以参考以下著作：范·杜因：《经济长波与创新》，刘守英、罗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Vincent Barnett，“Which was the ‘Real’ Kondratiev: 1925 or 1928?”，*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vol 24，no 4（2002）。

② 国内不同学者的翻译略有不同，有人翻译为欧内斯特·曼德尔，也有人翻译为厄尔奈斯特·曼德尔，均为同一人。

③ 欧内斯特·曼德尔：《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解释》，赵春明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序言”，第1页。

④ 范·杜因：《经济长波与创新》，刘守英、罗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第69页；Patrick Clawson，“A Review of Ernest Mandel’s Late Capitalism”，*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vol 8，no 3（1976），pp 72-74。

⑤ 孟捷：《资本主义经济长期波动的理论：一个批判性评述》，《开放时代》2011年第10期；马国旺：《评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要贡献》，《政治经济学评论》2016年第1期。

—

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物质基础问题，一直以来存在着不同看法。马克思认为经济周期的物质基础是固定资本更新，而固定资本的更新引起资本积累的变化，进而造成资本主义经济的波动。第一，固定资本大规模更新是大工业时代的产物。马克思认为大工业时代以机器大生产为主要特征，“现代工业这种独特的生活过程，我们在人类过去的任何时代都是看不到的”。<sup>①</sup>与简单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幼年时代”相比，只有到机器大工业在社会生产中占据主导地位时，才会出现较大规模的固定资本更新。第二，大规模的机器运用呈现出一定内在规律性。这种规律性表现在“这种由一些互相连结的周转组成的长达若干年的周期（资本被它的固定组成部分束缚在这种周期之内），为周期性的危机造成了物质基础……虽然资本投入的那段时期是极不相同和极不一致的，但危机总是大规模新投资的起点。因此，就整个社会考察，危机又或多或少地是下一个周转周期的新的物质基础”。<sup>②</sup>马克思这里所指的周期是工业周期，大约十年，“现代工业……穿插着较小波动的十年一次的周期形式”，<sup>③</sup>“大工业中最有决定意义的部门的这个生命周期现在平均为十年”。<sup>④</sup>与工业周期相比，长波同样作为经济周期的一种类型，自然也需要回答波动的基础是什么。

在固定资本更新论的基础上突出技术视角，围绕利润率与技术的互动关系展开阐述，这是曼德尔长波理论的第一层次维度。曼德尔指出，与流动资本相比，固定资本是数额较大的资本支出，但固定资本具有较长的使用周期，在此期间资本家积累了大量尚未转化为物质资本形态的资本。当新的技术革命爆发后，新技术大大降低了个别商品的成本，推动资本家获得超额利润，从而使得资本家将之前大量积累的资本转化为新的投资，由此促进了经济的高涨。在这里曼德尔特别区分了固定资本扩大再生产的两种方式：一种是在没有技术变革情形下单纯的固定资本更新，另一种是由基本技术变革引发的固定资本更新。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相互关联性，基本技术变革还引发了诸多额外资本的投资，包括新的配套的生产资料、基础设施等。基本技术引发的投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29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07页。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29页。

④ 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07页。

资数量和持续时间比单纯固定资本扩大更新带来的投资显著增加，使得资本主义经济在更大深度和广度上呈现出阶段性的波动，从而形成了长波，“每一个重要的技术发明时期都似乎是一个资本积累突然加速的时期”。<sup>①</sup>曼德尔指出，基本技术表现在动力技术和能源机械方面，其变革导致整个经济体系的全部技术的变化，第一次长波是以手工制造或机器制造的蒸汽机逐步扩散为基本特征，第二次是机器制造的蒸汽机的普遍应用，第三次是电力机械和内燃机的普遍应用，第四次是电子仪器控制机器的普遍应用。

曼德尔的固定资本更新论不仅是对马克思关于经济周期变动物质基础理论的继承和发展，而且是对其他周期理论的有力拓展。与马克思一样，曼德尔认为长波形成和向上运动的物质基础也是固定资本及其附属物的更新，恰如他所言，“马克思……预见了一切现代的经院式周期理论”。<sup>②</sup>马克思提出摆脱危机的物质基础更新是按照工业生产周期确定的，固定资本生命周期的长度决定了工业周期的长度，而工业周期下的固定资本更新并不涉及基本技术的巨大变化。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是工业革命时期，生产力的发展仍然处于工业革命的笼罩之下。马克思已经指出技术变革会对资本主义产生重大影响，强调“一旦与大工业相适应的一般生产条件形成起来，这种生产方式就获得一种弹性，一种突然地跳跃式地扩展的能力”。<sup>③</sup>但囿于时代条件，马克思无法对不同技术革命主导下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波动性展开更为具体详尽的分析和比较。曼德尔以马克思的理论为基础，充分结合历次重大技术革命，把对资本主义经济波动性的研究拓展到更长的历史时间范围内。这种拓展弥补了康德拉季耶夫对长波解释的不足。康德拉季耶夫以资本品置换周期为基础研究长波，明显受到马克思理论的影响，但他未能有效解释资本品等固定资本更新为何集群式出现，而不是连续出现。实际上就全社会而言，资本循环在时间上继起空间上并行，资本品的更新也是连续的，这种连续性的固定资本更新周期明显较短，资本更新数量也不足以长久的经济高涨提供支撑，因而并不能有效解释长波的时间跨度。曼德尔基于技术的长波物质基础观点也明显区别于其他一些古典周期理论。古典周期理论大多是短周期或中周期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部分解释资本主义经济中短期的波动性，如亨利·穆尔的气候周期论认为气候阶段性变化会相应引起农业减产，进而引发经济波动。<sup>④</sup>而一旦像曼德尔那样将视域拓展到更长时间段，古典周期的许多理论就无法有力解释长达几十年的经济波动。

① 厄尔奈斯特·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马清文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26页。  
② 厄尔奈斯特·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马清文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23页。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19页。  
④ Henry Ludwell Moore, *Economic Cycles: Their Law and Cause*, New York: Macmillan, 1914.

不只是曼德尔分析了技术革命条件下固定资本扩张促成长波，熊彼特也曾作过类似的表达。熊彼特认为在技术革命下，固定资本扩张形成对生产资料和消费品需求的增长，同时促进了信贷和资本品的扩张，引起经济高涨。<sup>①</sup> 对于技术革命的作用，有学者认为技术革命既是熊彼特长波也是曼德尔长波发生的根本原因，两者之间互通声气。<sup>②</sup> 但是，将长波原因归结于技术范式遭到了曼德尔的激烈反对，对技术革命的解释也远不是曼德尔长波理论的重点，“这种技术革命……当作工业平均增长速度长期高涨的原因的思想，与我的分析是风马牛而不相及的”。<sup>③</sup> 从曼德尔思想发展看，他对技术革命在长波中作用的认识经历了一个转变的过程，在较早出版的《晚期资本主义》中他用大量篇幅叙述了技术革命对长波形成的影响，并且对长波的划分以历次技术革命的发生作为参照系，可以看出他受到技术主义分析方法的较大影响。而在随后不久的《资本主义发展长波——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中，为了避免误解，他则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内在特点出发对长波进行划分。

曼德尔与熊彼特在长波形成原因上确有相似之处，但在形成机制上两者有明显差异。熊彼特认为长波是由创新引起的投资，创新在长波中处于中心地位，而创新背后的动力是企业家的创造性精神，企业家的创造力和破坏性促进了大规模投资的形成。<sup>④</sup> 曼德尔则认为把扩张长波背后的动力归结为企业家精神这样的心理因素显然是不合适的，他提出利润率才是长波背后的主要动力，“利润率的增长、衰退以及恢复生气，既相适应于又控制着资本积累的连续的运动”。<sup>⑤</sup> 利润率的动力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从萧条长波转向扩张长波的过程中，利润率的重新提升引发资本家恢复投资，而且只有在利润率持续高涨的过程中，技术革命带来的巨大生产力的持久变动才能实现。因为技术变革最初产生和应用的范围是较为狭窄的，只有在利润率提升的持续促进下，才会有更多资本进入“尚未运用或仅得到边际运用的发明余地”。<sup>⑥</sup> 随着资本进入基本

<sup>①</sup> Joseph Alois Schumpeter, *Business Cycles: A Theoretical, Historical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Capitalist Process*, New York: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1939.

<sup>②</sup> 孟捷：《战后黄金年代是怎样形成的——对两种马克思主义解释的批判性分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年第5期。

<sup>③</sup> 欧内斯特·曼德尔：《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解释》，赵春明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7页。

<sup>④</sup> Joseph Alois Schumpeter, *Business Cycles: A Theoretical, Historical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Capitalist Process*, New York: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1939.

<sup>⑤</sup> 厄尔奈斯特·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马清文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22页。

<sup>⑥</sup> 欧内斯特·曼德尔：《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解释》，赵春明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0页。

技术应用领域，技术革命提高了资本的利润率水平，进而引发了基本技术在应用领域的扩张和普及化。在进入扩张长波后，基本技术进入到强化阶段，持续高涨的平均利润率水平满足了技术强化阶段的大量支出。显然在扩张长波的形成过程中，利润率对技术革命的持续进行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其二，从扩张长波向萧条长波变化的过程中，由于技术变革引发的是节约劳动型的资本投资，相伴而生的是资本有机构成提升，进而造成了利润率的下降。资本积累的变动是由利润率的变动引起的，当社会平均利润率下降，资本出现相对过剩，资本积累速度放缓，长波进入萧条阶段。

在曼德尔看来，就技术基础与利润率的关系而言，危机过后利润率的逐步恢复诱发投资的增加，如果此时新技术已经产生，资本家可通过投资完成对新技术的运用推广，在生产中表现为使用更为先进的生产工具，实行更科学的生产过程等，降低产品的个别生产价值，从而实现较高的利润率水平。重大技术变革具有应用广泛、深入持久的特点，围绕重大技术变革开展的投资涉及多个社会生产部门，经历多个资本周转周期。在这一过程中，技术扩散为资本寻找新的投资场所、追逐较高利润率提供了必要生产条件。可见，曼德尔的分析没有忽略技术的重要性，他重视技术变革对于降低生产成本、维持较高利润率的支撑作用。但在技术基础与利润率二者的关系中，他将利润率置于更加突出的位置，将其作为技术得以顺利应用和扩张最直接最有力的因素。恰如他自己所言，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没有利润率的中心作用，就不会有以新技术为载体的投资与生产。

表 1 长波不同阶段与利润率变化、技术变化的对应关系

长波阶段	萧条长波后期	扩张长波前期	扩张长波后期
利润率变化	利润率重新上升	利润率高涨	利润率下降
基本技术变化	基本技术在局部范围内运用	基本技术运用强化	基本技术运用趋于成熟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曼德尔著作中的有关论述整理得出。

曼德尔将利润率作为影响投资变动的直接动力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分析逻辑的。在马克思看来，追逐剩余价值和利润是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内在动力，只有锚定利润率的变化，才能从本质上把握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动态。《资本论》第一卷研究的是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第二卷是剩余价值的流通过程，第三卷是剩余价值生产与流通统一的总过程，揭示了剩余价值如何通过利息、地租等形式分配给不同的职能资本家。由于从剩余价值到利润、从剩余价值率到利润率要经过复杂的转化过程，总过程最为接近于资本主义现实的面貌，而就资本家个人决策来说，“那么很清楚，他惟一关心的，

是剩余价值即他出售自己的商品时所得到的价值余额和生产商品时所预付的总资本的比率”，<sup>①</sup> 利润率成为资本现实运动最直接、最强大的推动力。必须看到，曼德尔将利润率带来投资增加的过程看作基本技术扩散的过程，这样的论证还存在不完善之处。就全社会而言，利润率的提升确实会促进更多闲置的社会资本进入到生产领域，但是否能有效进入到基本技术运用领域仍然有待观察。技术进步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在原有技术体系上的局部改良，通过产品或者工艺改进实现，表现出投资小、风险低的特征；另一种是基本技术的变革，往往涉及整个生产体系，表现出投资多、不确定性强、风险大的特征。萧条阶段的利润率虽然比危机时刻有所回升，但仍然处在较低的水平上，就投资决策而言，资本家为规避风险，更倾向于采用技术改良的手段完善产品工艺，而不愿将大量资本投入到新的基本技术领域。此外，在探讨利润率提升引致基本技术扩散的过程中，曼德尔也没有深入论述利润率应当恢复到何种程度才能推动资本在一定规模上进入到新的基本技术领域。

## 二

曼德尔虽然强调利润率的推动力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忽视其他因素的作用。他认为利润率是“由足够数量的因素所决定的”，<sup>②</sup> 这些足够数量的因素使得利润率成为一种综合性表达。对利润率成为其他因素综合性表达的认识是理解曼德尔长波的第二重维度。曼德尔将利润率重新提升看作资本运动内在逻辑与外生因素相结合的结果。一方面，资本运动的内在逻辑反映在资本的二重性作用上。危机过后及萧条长波阶段存在的过剩性资本，是资本主义危机的产物，与此同时，由于大量生产性资本已遭到毁坏和贬值，资本的竞争程度下降，在萧条长波后期这些资本的利润率水平又开始逐步提升。另一方面，外生因素反映在市场的突然扩大、原材料价格的下降、战争与革命等上。之所以强调外生因素的作用，是因为外生因素具有偶然性，资本家进行大规模的投资如果没有较高利润率的推动，是难以维持的，偶然性事件对推高并维持高利润率水平至关重要。因此，在对资本主义历次长波的分析中，要充分考虑外生因素。

<sup>①</sup>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1页。

<sup>②</sup> 欧内斯特·曼德尔：《对资本主义发展长波的解释》，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编《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十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3页。

具体来看，曼德尔将资本主义的发展划分为以下几个长波：1793—1847（1793—1825 年为扩张阶段，1826—1847 年为萧条阶段），1848—1893 年（1848—1873 年为扩张阶段，1874—1893 年为萧条阶段），1894—1939 年（1894—1913 年为扩张阶段，1914—1939 年为萧条阶段），1940（1948）年至今 1967 年为扩张阶段，1968 年至今为萧条阶段）。<sup>①</sup> 他指出促成第二次扩张长波的外生因素包括 1848 年革命、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现、交通革命；第三次长波形成的外生因素包括原材料价格下降、帝国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势力范围的划分；第四次长波形成的外生因素包括三四十年代工人阶级斗争的失败、国际货币市场的诞生、电信和信用革命等。而当扩张长波转入萧条长波，曼德尔对这一过程的解释是从资本主义运动的内生规律（即平均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出发。随着新的基本技术的广泛运用，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使得平均利润率下降，进而投资缩减，资本主义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在这种分析框架下，由于外生因素的作用，资本主义的内生机制并不一定形成扩张长波，长波具有显著的不确定性和非对称性的特质。乍一看，曼德尔的各个长波及长波扩张、萧条阶段的时间长度的划分与其他长波理论并无太大差异。调节学派创始人之一博耶就认为曼德尔长波的时间跨度是相对固定的，“曼德尔……认为资本主义的历史是先强后弱的积累浪潮，每个长波（注：指的是扩张或萧条长波）大约持续四分之一世纪”。<sup>②</sup> 但这种说法并不符合曼德尔的本意，在他看来，长波及内含的扩张（萧条）阶段呈现出的表面上的对称性只是一种历史巧合。

表 2 不同学者对长波的划分

拐点	康德拉季耶夫	戈登、爱德华兹和里奇	范杜因
波谷	1780 年代末—1790 年代初	1790 年代	—
波峰	1810—1817	1820	—
波谷	1844—1851	1840 年代中期	1845
波峰	1870—1875	1873	1872
波谷	1890—1896	1890 年代末	1892
波峰	1914—1920	一战	1929
波谷	—	二战	1948
波峰	—	1970 年代初	1973

资料来源：转引自大卫·科茨：《长波和积累的社会结构：一个评论与再解释》，《政治经济学评论》2018 年第 2 期。

① 对于第四次长波，曼德尔认为美国从 1940 年开始，欧洲大陆受二战影响较大，从 1948 年才开始。而且他认为 80 年代后资本主义经济的重新高涨并不是新一轮长波，这一点与部分学者的观点有差异，可以参考高峰《论长波》关于这一问题的探讨。高峰：《论长波》，《政治经济学评论》2018 年第 1 期。

② 罗伯特·博耶：《当前的危机：历史的视角》，1979 年，<https://bit.ly/3819QdN>。

对于曼德尔长波的非对称性特质，批评者多集中在他对于外生因素的理解。一种批评意见认为由萧条长波向扩张长波的转变必须通过内生经济机制解释，而曼德尔诉诸外生因素是错误的。在曼德尔之前，康德拉季耶夫等人将长波产生原因置于内生经济机制中，声称“长期波动产生于资本主义经济实质所固有的那些原因”。<sup>①</sup> 批评者认为曼德尔不得不借助于超经济的外生因素解释长波回升，进而批评他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平均利润率的下降趋势起主要作用的理论”。<sup>②</sup> 对于这种批评，笔者认为外生因素体现了对平均利润率下降的暂时性反动，与马克思强调的平均利润率存在的下降趋势并不悖离。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并不意味着平均利润率在资本主义进程中是直线下落的。马克思在肯定下降趋势的同时，在《资本论》第三卷第十四章中指出了阻碍利润率下降的若干因素，包括劳动剥削程度的提高、工资被压低到劳动力价值以下、不变资本要素变得便宜、相对过剩人口、对外贸易、股份资本的增加等。曼德尔对外生因素的重视不仅受到非马克思主义学派的非议，也是他和早期的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分歧的焦点所在。早期的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认为萧条长波转向扩张长波是资本主义制度演变的必然结果。在该学派看来，不仅经济因素是内生的，而且包括各类社会因素、政治因素等非经济因素也是内生的。资本积累和广泛的社会结构互相作用，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规律支配的，积累的社会结构导致长波的产生。<sup>③</sup> 曼德尔并不反对像阶级意识等因素是由内生的经济因素决定的观点，他反对的是在一定历史范围内，将这些因素直接看成经济发展的结果或由经济发展决定。他认为该学派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行的理解过于机械，历史事件的产生并不完全是既有的社会积累结构的逻辑产物。

另一种批评意见认为曼德尔对外生因素的考量太过狭隘。这种看法又可以细分为两类。第一类认为不仅从萧条长波向扩张长波转变需要外生因素作用，从扩张长波转向萧条长波，外生因素作用同样巨大，曼德尔忽视了后一种情形。如麦迪森认为由繁荣转向萧条长波的发生时间是由无法预测的因素导致的；<sup>④</sup> 罗伯特·布伦纳也认为资本主义具有活力，是外生因素的偶然性造成了长波的转变。<sup>⑤</sup> 对于曼德尔与这些学者的分

① 尼·康德拉季耶夫：《经济生活中的长期波动》，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编《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十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0页。

② 范·杜因：《经济长波与创新》，刘守英、罗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第69页。

③ David Gordon, Richard Edwards and Michael Reich, *Segmented Work, Divided Worker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④ Angus Maddison, *Phases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⑤ Robert Brenner, *The Economics of Global Turbulence*, London: Verso, 2006.

歧,我们认为,一方面,这类批评是不正确的,资本主义自身具有内在规律,把长波运动完全归结于外生因素,否认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另一方面,从扩张向萧条的转变,不可否认也有各种各样外生因素的影响,曼德尔的确重视不足。第二类认为曼德尔在对外生因素的探讨中,没有涉及文化领域、意识形态的斗争。<sup>①</sup>在曼德尔提出的外生因素中,固然更强调“政治和社会斗争的结果——阶级斗争、帝国主义内部的斗争、战争、革命、反革命”,<sup>②</sup>但曼德尔丝毫没有忽视意识形态的作用,比如他认为新自由主义兴起对资产阶级加强剥削和消解工会的力量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更进一步看,文化、意识形态的斗争对资本主义长波固然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文化等因素对长波的影响相对比较间接,自然不会被纳入到分析的重点中,曼德尔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做到分析上的面面俱到。

对于上述两种不同的意见,需要进一步在方法论层次上探讨曼德尔对外生因素的理解。曼德尔受到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的强烈影响,他从六个方面总结了马克思的辩证方法,分别为深入占有经验材料、分析材料并划分抽象因素、探索因素之间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般联系、发现决定意义中的中间环节、基于一般联系和中间环节对具体历史进行实践和经验方面的验证、在实践中发现新的联系。曼德尔正确区分了马克思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区别,认为其研究方法是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而叙述方法则是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理论模式实际上包含了在探索中的具体课题的一切实质因素”,<sup>③</sup>抽象和具体之间存在着彼此沟通的桥梁。他提出资本运动规律能与多种资本的具体的、现象方面形式相协调,在他看来也就是马克思方法论中的逻辑与历史的统一。他批评一些人将马克思发现的资本主义规律视为一种抽象的概念,无法通过具体的现实的经验来验证,或者认为在短中期中,运动规律与暂时事件并不存在因果联系的可能。对此,他力图寻找统一抽象规律与“具体历史”之间的中间环节。

为实现这种资本主义“抽象的‘总的资本’与具体的‘多种资本’之间的调解”,<sup>④</sup>曼德尔从两个层次上把握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第一层次是从纯粹的资本主义运动规律出发。曼德尔提出了理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六个基本变量,分别是资本有机构成、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的分配、剩余价值率、资本积累率、资本周转时间、两大部类的

① 唐正东:《在科学抽象与具体历史之间:方法论的视角》,《东岳论丛》2008年第3期。

② 欧内斯特·曼德尔:《对资本主义发展长波的解释》,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编《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十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7页。

③ 厄尔奈斯特·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马清文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1页。

④ 厄尔奈斯特·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马清文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5页。

交换关系等，这六个变量均内生于资本主义经济系统，这些变量具有半自主变量的性质，它们之间相互交互运动，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程中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但从整个资本主义系统看，它们又按照一定关系构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规律，这些规律有十条，分别为价值规律、资本积累规律、剩余价值规律、利润率平均化规律、资本集中和积聚规律<sup>①</sup>等，这些确定性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的最终历史趋势。第二层次是从非纯粹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出发。曼德尔认为现实世界并不是纯粹的资本主义生产模式，还包括了诸多非资本主义、半资本主义因素。只有在纯粹的资本主义模式内，资本主义的具体历史才完全是内生的产物，而现实中的具体历史是资本主义制度和发展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外生因素。不过外生因素也是半自主变量，非完全独立的外生变量。一方面，外生因素在一定时期内，与内生因素相互作用，外生因素对资本主义发展产生影响，使得资本主义必然规律发生曲折性。另一方面，不能机械地理解外生因素与内生因素的关系，外生因素对资本主义的影响毕竟是有限的，从根本上仍然要服从资本主义内在规律的支配，从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而言，它们又成为内生的，“外生的超经济因素……并没有激起转折的动态过程……这种过程只能由资本主义运动规律的内在逻辑解释”。<sup>②</sup> 由此曼德尔在逻辑与历史之间寻找到的中间环节分别是半自主性的内生因素和半自主性的外生因素（在一定时间范围内而言），这些中间环节体现了马克思关于范畴的转化依靠中介的方法论。资本主义现实情况是纷繁复杂的，要想透过复杂的现象去认识事物的本质极为困难。规律是本质的揭示，而“具体历史”则表现为现象的直观反映。马克思重视中介的作用，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中，依靠中介实现了范畴之间的转化，将一般规律与“具体历史”统一起来，他指出“决不能不通过任何中介环节，而把一般的抽象形式同它的任何一个特殊形式混淆起来”。<sup>③</sup> 资本主义具有的若干规律是一般的抽象形式，“具体历史”则包含许多特殊形式，曼德尔把扩张长波的发生看作一种特殊形式，需要通过一系列半自主的中间变量作为认识资本主义运动规律的中介，无疑是正确的。但马克思对中介之间的彼此关系阐述清晰，环环相扣，有着严密的逻辑性，而曼德尔笼统地将若干相关因素作为中介，既缺乏对中介一定程度的必要抽象和概括，也缺乏对中介之间逻辑关系的

<sup>①</sup> Ernest Mandel, "Partially Independent Variables and Internal Logic in Classical Marxist Economical Analysis",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vol 24, no 3 (1985), p. 489.

<sup>②</sup> 欧内斯特·曼德尔：《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解释》，赵春明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9页。

<sup>③</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72页。

深刻阐述。

在曼德尔的语境中，他将外生因素称作“这样一些偶然事件”，<sup>①</sup>而偶然性是马克思主义的又一关注重点。首先，马克思认为偶然性是一种不确定性，既有可能发生也有可能不发生，因而不能将丰富具体的历史事件全部看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逻辑的必然产物。从这一点上看，上述曼德尔对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的批评是正确的。其次偶然性对世界历史进程具有加速或延缓的作用。马克思指出，“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么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sup>②</sup>曼德尔充分重视这种偶然性对历史进程的作用，将偶然性造成的扩张长波形成视为对资本主义衰退的延缓。不过另一方面，需要从偶然性与必然性的关系中去把握偶然性，“一种社会活动，一系列社会过程……越是显得受到纯粹的偶然性的摆布，它所固有的内在规律就越是自然的必然性在这种偶然性中去实现自身”，<sup>③</sup>显然偶然性又是必然性的反映，偶然性为必然性开辟道路。比较遗憾的是，曼德尔尽管认为外生因素要受到资本主义运动规律的制约，但未能很好地解释这种偶然性造成的长波为何在资本主义进程中一再发生，这诸多偶然性究竟如何反映为资本主义内在规律的必然性。实际上，曼德尔的著作已经涉及了扩张长波的偶然性与必然性之间的关系，如他认为市场突然扩大是外生的偶然因素，但资本主义扩张内在驱动力的必然性才使得市场扩张成为推动资本主义经济高涨的原因，“不论是在每一个个别的国家还是就国际而言，资本的发展都是从中心……向周围进行的。它总是设法向新的领域扩展，把一些商品简单再生产的新的部门转化成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领域”，<sup>④</sup>但他没有继续深入探讨这种关系。

在对长波内外生因素的理解中，还蕴含着曼德尔对多因素共同作用的认识，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特有的综合分析方法的运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内部经济因素、“外部”环境变化以及通过社会政治发展所达到的调整等因素有机地结合起来，赋予了长波运动历史的综合“总体”特征。<sup>⑤</sup>在探讨长波的运动中，从萧条长波到扩张长波曼德尔列举了 9 个影响因素，从扩张长波转向萧条长波列举了 13 个影响因素。同时，这种综合总体特征

① 欧内斯特·曼德尔：《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解释》，赵春明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年，第 23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0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354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192 页。

④ 厄尔奈斯特·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马清文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 年，第 48 页。

⑤ 欧内斯特·曼德尔：《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解释》，赵春明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年，第 97 页。

表现在长波不是由单纯的经济增长率的变化或积累率的变化引起，而是具有混合性特点，其间涉及技术变化、阶级关系、国家功能等多个方面。曼德尔多因素的作用论受到恩格斯和托洛茨基的深刻影响。他反对将长波原因解释为单一性的因素，批评卢森堡将资本主义的停滞归结为剩余价值实现困难，也批评希法亭将资本主义竞争看作单一原因，“坚决拒绝对资本主义发展中的长波的接续作任何‘单一原因’的解释”。<sup>①</sup>唯物史观在对历史运动规律进行总结时，明确了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性作用，但这种决定性作用是归根到底而言的。恩格斯晚年多次阐述了经济因素与其他因素之间的关系，“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sup>②</sup>恩格斯明确表示了对纯粹经济主义的反对，而将历史事件的发生看作是包括经济因素在内的多因素综合结果。托洛茨基将恩格斯的这一思想运用到长波理论中，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曲线》一文中，他强调对长波的分析不能局限在所谓纯粹经济资料的分析中，而是要结合诸如政治、社会等方面的发展，“诸如战争和革命等上层建筑秩序的主要事实，决定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上升、停滞或下降的时代的特征和替代”。<sup>③</sup>曼德尔就此评价道：“很明显，这种升降并不是取决于一个单一的因素，而必须用一系列的社会变化来加以解释，在这些社会变化中，托洛茨基所列出的那些因素，起了主要的作用。”<sup>④</sup>

### 三

从长波的连续运动看，康德拉季耶夫、熊彼特等对长波的分析仍然局限于古典周期的分析框架内，古典周期性质的周期波动在时间跨度和内容表现上都具有相似性。曼德尔对长波的认识具有一种整体观，从整个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视野出发，将长波运动置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中考察，这是曼德尔长波理论的第三重维度。

曼德尔对各个不同时期的历史长波进行了比较考察，他指出一战以后的长波是资

<sup>①</sup> 欧内斯特·曼德尔：《对资本主义发展长波的解释》，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编《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十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2页。

<sup>②</sup>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1页。

<sup>③</sup> 托洛茨基：《资本主义发展的曲线》，《第四国际》1941年第4期。

<sup>④</sup> 厄尔奈斯特·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马清文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40页。

本主义整体陷入结构性危机时代的长波。由此他提出 1914 年是资本主义制度由上升转为下降的分水岭，“自 1914 年以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进入了它的历史衰退期。那个制度创造出来的巨大生产力，正周期性地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私人占有方式……发生矛盾”。<sup>①</sup> 曼德尔批评了两种对资本主义发展的认识：一种是认为随着二战后资本主义势力范围的大幅缩小，随着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及民族国家的独立，资本主义处在必然的衰退当中；一种是认为二战后资本主义强劲的经济恢复和繁荣意味着资本主义仍然具有旺盛强大的生命力。曼德尔并不否认在二战后长波期间展现出的经济繁荣、生产力和劳动生产率的巨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失业率的显著下降及一系列社会进步的改革的成功。他着重比较了一战之前的扩张长波与之后的扩张长波的区别。这种区别主要涉及两个方面。首先，资本主义国家地位升降和国际货币体系升降的关系。一战之前英国是世界霸主，英镑为世界货币，国际货币体系以黄金为基础，无需政府干预，具有自动调节偏差的能力。二战以后美国劳动生产率相对下降，根据“格雷夏姆规律”，世界货币美元必然贬值，美国政治军事霸权与美元地位的下降表现出不一致性，其霸权无法阻止美元地位的下降。其次，政策手段运用的改变。资本主义的矛盾表现为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对于一战前的 1893—1913 年生产过剩危机，资产阶级可以通过正常的市场进行调节，这说明了资本主义制度尚具有稳定性。而二战以后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大量发行货币，采用通胀的反危机政策进行调节。曼德尔认为信用膨胀促进了市场的繁荣，使得企业和个人通过负债方式，在超出自身能力情况下进行扩张并创造出广泛的市场，信用膨胀刺激经济繁荣，延缓了矛盾的爆发。这些区别总括性地反映了世界性资本过度积累导致了平均利润率的下降，资本主义通过自动调整解决危机越来越困难，因而只能依赖国家功能不断扩大，在总生产领域进行广泛调节以解决资本增殖和剩余价值实现的困难。与之相反，在资本主义制度的上升期，资本对国家功能采取的却是限制性态度，力图通过削减各类国家开支以保证更多资本用于增殖。可见危机已结构性根植于资本主义体系中，新的扩张长波需要“通货膨胀的人为刺激、不断增长的国家干预和连续的重整军备等等”。<sup>②</sup>

基于曼德尔的理解，可以将整个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看作一次特殊的长波或超级长波，这个超级长波包含一次总体上的上行阶段和一次总体上的下行阶段，拐点则是

<sup>①</sup> 欧内斯特·曼德尔：《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与 20 世纪社会现实》，颜岩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年，第 129 页。

<sup>②</sup> 欧内斯特·曼德尔：《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解释》，赵春明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年，第 73 页。

1914年。对于1914年是资本主义制度历史发展转折点这一论断，尽管曼德尔给出了充分的理由，但我们仍不敢轻易赞同这一论断的准确性。因为资本主义是一个极其漫长的历史过程，按照马克思著名的“两个决不会”的观点，资本主义对生产力有着较强的容纳力。回溯资本主义历经的四五百年的发展史，也可以发现资本主义具有较强的自我调节能力，能够在克服多次重大的经济政治危机后，仍然较大幅度地实现社会经济发展。在这一点上，曼德尔低估了资本主义克服危机的能力。而且曼德尔将资本主义国家功能发挥情况作为拐点的重要依据仍然有待完善。资产阶级现代国家的职能集中在经济领域内，无疑要求其作为总的资本家发挥作用。不过国家作为具有一定独立性的上层建筑，具有阶级职能和社会职能的双重性。曼德尔侧重考虑了国家功能的扩大对巩固资产阶级统治、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也需要辩证认识资本主义国家在扩大社会职能方面具有的积极意义并加以肯定。尽管如此，曼德尔提出的超级长波—长波—工业周期框架对于我们理解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仍然具有积极的意义。马克思对平均利润率变动的分析集中于工业周期和资本主义总过程，工业周期内平均利润率经历了上升、下降、低谷、恢复的变动过程，资本主义总过程内平均利润率则集中表现为下降趋势。曼德尔在此基础上提出“有必要采纳第三种时间结构”，<sup>①</sup>将长波置于二者之间进行认识，进而形成了比较完整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发展波动理论。资本主义的全部生命就是不同层次的波动展开的历程，超级长波反映的是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由历史性上升到历史性下降的巨大波动，长波反映的是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的深化，工业周期反映的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性周期过剩危机。一个超级长波包括若干长波，一次长波包括若干工业周期，在这一结构中，工业周期、长波、超级长波互相联系又彼此连贯，长波通过周期贯彻表现，超长波又通过长波贯彻表现，成为一个有机整体。曼德尔长波理论构建的分析框架，有助于从更高层次、更为宏观的视野把握资本主义的各历史阶段。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是波动式的，特定历史时期内经济的高涨，不能简单认为是资本主义强大生命力的表现，同样一个时期内经济的衰退也不能武断定义为资本主义濒临死亡的标志。而是应当充分结合资本主义总体历史进程的上（下）行阶段、扩张（萧条）长波、工业周期复苏繁荣（萧条危机）三方面，来认识资本主义某一时期所处的历史方位。

曼德尔对不同历史时期长波特征的分析，本质上是从马克思揭示的生产力与生产

<sup>①</sup> 欧内斯特·曼德尔：《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解释》，赵春明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9页。

关系的互动关系中展开，充分揭示了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加剧的趋势。主流西方经济学只承认资本主义经济短期的波动，认为市场具有完美机制，在短期的供给失衡之后会自动实现出清。即使像熊彼特这样的非主流经济学家，虽然承认了资本主义长波的存在，但对各个时期的长波阐述仍陷入了类推解释中，资本主义进程变成了无止境的相似长波的循环。马克思指出，“资本本身在其历史发展中所造成的生产力的发展，在达到一定点以后，就会不是造成而是消除资本的自行增殖。超过一定点……资本关系就变成对劳动生产力发展的一种限制”。<sup>①</sup> 在这种矛盾深化的必然逻辑下，扩张长波的实现也愈发困难。对于新的扩张长波是否有可能到来，曼德尔着重从价值关系的角度进行了分析。由于机器对工人的广泛替代、预付资本大幅增加、劳动力显著减少，即使劳动生产率提高和剥削强度增大，剩余价值率提高仍然受到极大限制。同时二战以来服务业迅猛发展也不能有力提高剩余价值率，毕竟服务业的岗位逐步被机器所取代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因此，在平均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作用明显增强的背景下，仅靠技术性手段不能够实现新一轮扩张长波，实现扩张长波要求阶级力量关系发生重大变化，而这取决于政治和社会斗争的结果。可见，曼德尔将形成扩张长波可能性的探讨越来越集中在对生产关系的论述上，认为资本主义新一轮长波扩张必然要以工人阶级利益的大幅度受损和加强对不发达国家的剥削为代价。

早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面对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主义者之间关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曾出现争论。伯恩斯坦否认资本主义将出现重大危机，认为资本主义将迎来长久的和平发展时期，“根本不再遇到一向的那种营业危机，并且必须抛弃一切把它当成巨大社会变革的前导的冥想”。<sup>②</sup> 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指出资本主义已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垄断资本对内排挤打压中小资本维护其垄断利润，对外进行扩张、瓜分殖民地进行资本输出，帝国主义国家内部和彼此之间的矛盾冲突不断加深。<sup>③</sup> 一战和二战的历史进程充分表明了列宁对垄断资本的正确判断。不过二战以来资本主义又进入到新的发展时期，国家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调节、新的技术革命推动、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有力实施使得资本主义迎来了新一轮长期的经济扩张。这种情况否定了资本主义在短时期内行将崩溃的论断。新情况给马克思主义者带来了新的挑战，需要分析资本主义出现较长时间繁荣的原因。曼德尔认为二战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 149 页。

② 《伯恩斯坦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年，第 65 页。

③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年。

以后的长波虽有自身特点，但仍没有超出列宁的分析的基本框架，“晚期帝国主义的时期，已经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时期。它只不过是帝国主义的、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进一步发展”。<sup>①</sup> 这种发展表现在国际资本积聚向资本集中转变、金融资本与工业资本的结合蜕变为金融资本的深化和普遍化，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越来越侵入到社会生活的全部领域，与之伴随的是爆炸性的世界政治与经济危机。在从古典帝国主义向晚期资本主义的转变中，曼德尔将资本主义的下降看作一个缓慢的历史进程，在这一进程中垄断资本主义不断腐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愈发与生产力发展要求不相适应。

自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资本主义进入新一轮长期繁荣，这次繁荣带来的是矛盾的进一步激化，充分表明了曼德尔的预见性。其一，全球资本过剩进一步加剧。二战后的扩张长波时期，资本主义经济空前恢复，资本积累迅速加剧，造成了资本和生产能力过剩。70 年代左右转入萧条长波后，由于此次萧条长波时间较短，其间也没有发生二战那样严重的经济衰退，导致过剩资本未能得到充分摧毁。80 年代新的繁荣开始后，大量过剩资本仍然存在。在此环境下，资本为寻求利润，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将大量劳动密集型企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虽然短期内缓解了国内资本和生产过剩，但从长期看反而加剧了全球资本过剩。其二，资本积累模式中金融资本力量继续增强。以往扩张长波的产生是以产业资本为主导，产业资本的繁荣带来了经济的扩张。而在新一轮繁荣中，产业资本的地位和作用下降，一方面大量资本向金融行业转移，经营虚拟资本获得高额利润，加剧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虚拟化；另一方面金融资本的运营刺激需求，使得社会整体负债规模进一步扩大，通过债务透支促进经济增长。这种模式虽然短暂有效，但无法解决深层次的生产与消费的矛盾，更大危机的爆发不可避免，以至于在 2008 年爆发了蔓延全球的经济金融危机。

## 四

曼德尔长波理论的内容极为丰富，以上分析探讨了其长波理论的三重维度。第一重维度是在充分考虑基本技术变革影响的基础上，强调利润率与技术互动的过程也是资本积累的变动过程。第二重维度是从方法论的角度，在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提出了半自主的中间变量，将资本主义内生因素与外生因素有机结

<sup>①</sup> 厄尔奈斯特·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马清文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 年，第 3-4 页。

合，实现了对资本主义长波研究的逻辑与历史的统一。第三重维度是将长波置于整个资本主义发展史的宽广视野中，提出了超级长波—长波—工业周期的分析框架，揭示了在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背景下，扩张长波实现的困难程度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恶化，影响范围更广、更加剧烈的经济危机势必爆发。曼德尔长波理论的三重维度有助于我们从不同层次分析资本主义长周期的经济波动。第一重维度最为直接也最易观察到，即利润率提高的持续刺激带来投资的增加和经济的高涨，当利润率下降时，则表现为投资放缓、经济增长趋向停滞。不过曼德尔没有止步于此，他对利润率背后的推手进行了深入探讨。他通过资本主义的内在经济运动规律与外部因素的交互作用，说明长周期下利润率的波动性问题。这一维度的分析内容比第一层次的分析要抽象一些，涉及具体因素背后的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机制问题。最后一重维度则更进一步，立足更抽象、更为宏观的角度，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出发，探讨二者相互作用造成的经济巨大波动，指出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受制于现有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三重维度分别对应着微观层次、中观层次以及宏观层次，反映了曼德尔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下，通过三重维度的层层展开，构建了对资本主义长波全面立体的深刻分析。

自2008年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整个资本主义经济持续处于低迷状态。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逐步兴起，一些西方人士乐观地认为随着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到来，资本主义将走出经济困境，重新迎来新一轮的扩张长波。曼德尔从技术与利润率、内生因素与外生因素、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三重维度构建的长波理论为认识资本主义的未来发展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提供了有益的视角。尽管第四次技术革命的技术基础已日趋成熟，但其能否像预期的那样顺利引发新一轮扩张长波，还有待观察。重大技术变革引发扩张长波，需要一定水平的利润率引致才能实现。在技术推广阶段，产业资本的利润率尚不具有优势，且产业资本的利润实现需要经历相对较长周期。当前在国际垄断金融资本的主导下，金融资本的非生产性积累空前增强，金融资本的寄生性和腐朽性严重影响了资本在实体领域内作用的发挥，资本支撑新兴产业的意愿大大降低了。近年来美国等国出现的产业空心化现象就说明了这一点。此外，要形成新一轮扩张长波，不仅需要剩余价值生产能力的提升，还需要大规模实现剩余价值的条件。曼德尔极度重视重大历史事件为剩余价值吸收提供的广阔空间。二战以来，资本逐步建立起世界范围的不平等分工体系和价值分配链，20世纪八九十年代苏东剧变，原有的两个平行市场被打破，资本进一步加强了对非资本主义地区的空间渗透。当前全球经济关系资本化的加深意味着资本积累矛盾在世界范围内的扩散

加剧，绝大多数地区都被笼罩在资本的阴影之下，这也意味着资本通过空间修复转移缓和矛盾、兴起新一轮长期增长的历史机会愈发减少。在这一时代背景下，资本增殖的困难既会导致剥削的强化，也一定会加剧资本之间的恶性竞争，今后世界面临冲突和危机的概率显著增加了，我们必须对此有深刻的洞察、做好充足的准备。

## Three-dimensional Interpretation of Mandel's Long Wave Theory

*Huang Jin Tang Liu*

**Abstract:** Among a lot of theories that study the long wave of capitalism, Mandel offers a Marxist explanation. His long wave theory presents three dimensions: the first dimension is to highlight the technical perspective based on the renewal theory of fixed capital, and to elaborate on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fit rate and technology; the second dimension is based on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proposes partially independent variables, combines the laws of capitalist production methods with exogenous factors, and strives to achieve the unity of the movement logic of total capital and specific history; the third dimension is to place the long wave in the entire history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nd proposes a super long wave-long wave-industrial cycle framework, indicating that the difficulty in realizing the long wave expansion reflects the deterioration of capitalist production relations in the context of capitalist structural crisis. Mandel's long wave theory, constructed from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technology and profit rate, endogenous and exogenous factors, and productivity and production relations, provides a useful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and the major changes that seldom occurred.

**Key words:** Mandel; long wave; profit rate; Marxism

**Authors:** Huang Jin, professor of School of Economics,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Tang Liu, Ph. D. student of School of Economics,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